

# 经济学理论发展对跨学科知识的契合要求

——兼对一种错误认知观之审视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基于契合来发展理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不仅对自然科学是如此,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究其原因,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社会制度的调整更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正是由于任何社会问题的处理都不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社会关系牵涉在一起;因此,要真正理解社会现象,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知识的范围,要求进行跨学科的教育。不幸的是,随着独立的经济学院与经济学位的设立,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结果,不但经济学的学生很少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经济学依靠复杂的数理模型构筑起来的封闭体系也使得法学等学科越来越望而却步。同时,受“分”的思潮影响,目前学术界盛行着这样一个极大的误见:“专”即是“深”,而“通”则意味着“泛”。但实际上,对知识“深”的界定并不在于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原有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发展创新。

**关键词:**契合;跨学科教育;产权;知识分立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4)01-0074-08

## Requirement for Knowledge Consilience of Cross-Subject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A Survey on a Wrong View of Cognizance

ZHU 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Encyclopedical knowledge is needed to perfect theory based on consilience for social science as well as natural science since social phenomenon is mo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than natural phenomenon and more complex complication of interest is involved to adjust social system. Just as no social problem is isolated without other relationship,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ximize the scope of knowledge including cross-discipline knowledg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ocial phenomenon. Unfortunately, the gap between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is enlarging since the independent economics schoo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s degree. As a result, not only do economics student seldom learn the knowledg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but also the closed system of economics based on complex mathematical model obstructs disciplines. Moreover, under

收稿日期:2013-12-02

作者简介:朱富强,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the influence of “dividing”, such a serious misapprehension is in vogue in academic circle; specialist is profound while generalist is superficial. In fact, it is not what we have obtained but whether we have mastered and made development to justify the knowledge is profound or superficial.

**Key words:** concilience; cross-disciplinary education; property right; knowledge separation

## 一、前言

一般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契合的基础之上,从而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施乐公司帕洛阿托研究中心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布朗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说,“即使是一个科学家,像我这样,也必须承认知识是不能通过一个公式或方程式获得的。”<sup>[1]67-69</sup>显然,这不仅对自然科学是如此,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究其原因,因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从而具有某种公共性;不仅社会现象往往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而且社会制度的调整更是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正是基于研究对象上的这种差异,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实践应用上,社会科学领域所要求的知识类型都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一般地,自然科学领域所要求的一般专业基础知识比较多,这要求更扎实和严格的基础训练;社会科学领域所需要的知识则更广泛而全面,这些知识不只是来自课堂上的传授,更主要是来自自身的观察和思考。也即,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时需要大量的公共性知识和丰富的个别性知识,这些知识建立在长期学术人生中不断学习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在社会科学所涉及的诸领域中,几乎没有哪个具体问题仅仅依靠一门学科或某个特定理论就可以作出恰当的回答;而且,纵观经济学说史,那些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凡勃伦、维克塞尔、凯恩斯等都具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事实上,直到马歇尔1885年返回剑桥大学时,经济学还只是伦理学与历史学课程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获得学位而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在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时代,维也纳大学规定法律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些经济学课程;在维克塞尔时代,经济学是瑞典大学法律系的教学科目。

不幸的是,随着现代大学中系科的独立,本来统一的社会科学诸分支之间逐渐分裂了,从而出现了一个个相对封闭而独立的学科教学和研究体系,并导致各个分支学科学者的知识结构日益狭隘化。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以来,经济学就不仅与其他社会科学诸分支发生脱节,而且与自己的发展历程相割裂;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变成了基于特定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的自我演绎,或者无需任何思想根底的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走上日益封闭的我向思考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与二战以后科学至上主义思潮被不加思考地引入有关:它刻意地摆脱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与自然科学攀亲,试图构建“历史无涉”的普遍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崇尚理论的简洁和抽象而不是丰富和具体。正是基于这种思潮,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之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只是懂得一些计量工具和数理技巧,其研究对象也越来越集中在私利最大化的私人领域,经济科学也越来越失去公共性。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热衷于“证明两夸脱一瓶的番茄酱总是确切地卖一夸脱一瓶的那种两倍的价钱”<sup>[2]</sup>,而很少关注那些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这些主流经济学者往往被社会各界视为专家,并成为社会问题的咨询者和政策处方开立者,从而就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施特劳斯写道:“科学的发展导致专业程度不断提高,其结果是一个是否受人尊重取决于他能否成为某方面的专家。科学教育面临的危险是,它不再使人类变得广博和深邃。在此基础上可能构建的唯一的普遍科学——逻辑学或方法论——只专属于技术人员。于是,人们在一种新的普遍主义中追求专业化的解决之道,由于我们空间和时间视野的扩大,这种普遍主义几乎不可避免。”<sup>[3]24</sup>

## 二、经济科学研究的知识要求

一般地,人类社会本身就是通过个体间的互动而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任何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都具有公共性,都不能够在离开所有其他现象的孤立状态下而被彻底理解。例如,人性及其行为机理就是历史地演化的,它无法通过某种先验的抽象假定而被理解;同样,社会制度也与特定的时空和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它无法被抽象的演绎所认识。这种共生性实际上是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在人类世界中更为凸显。詹睦斯就曾指出,“要彻底地理解一事物,就要了解整个宇宙。一个事物与其他每个事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要认识有关这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需要知道它的所有联系。”<sup>[4]8</sup>梯利甚至强调,“不知道所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这一个。也正如世界是一个,科学也只有一个,各门科学共存互助。”<sup>[4]8-9</sup>同时,社会科学诸分支所研究的问题本身具有相通性:都是人类的互动行为及其衍生出的社会现象;只不过,各分支所基于的特定视角或层面存在差异,因而,跨学科的知识契合就有助于社会认知的全面和升华。譬如,达尔文就是通过阅读一些显然不相关的书籍作为消遣时才建立起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进化论观点,其中至少是受到了马尔萨斯著作的影响。同样,凡勃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提出他人所无法企及的思路和观点,也就在于他首先广泛地学习了自然史、哲学、社会学等知识。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审视经济学界的两位最重要的人物:一是经济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斯密,二是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凯恩斯。斯密为经济学奠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但他有关财富和经济活动的哲学却是在更早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出的;而且,除了该书以及其他有关自然法、自然神学和文学的著述外,斯密还撰写了另外六篇论文,从而试图构建一个有关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体系。熊彼特就写道:斯密的“计划就是要写一部‘有关各门文理学科和各种优雅艺术的历史’,但‘由于其过于庞大’,斯密放弃了它。这六篇论文中最为重要的第一篇,题为‘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以天文学史为例来加以说明’。我敢冒昧地说,谁不知道这些论文,谁就不会充分了解斯密所具有智力水平。我还敢冒昧地说,要不是有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谁都不会相信《国富论》的作者有能力写这些论文。”<sup>[5]277-278</sup>至于凯恩斯,斯基德尔斯基写道:“他生命中有很多时间是和文人墨客为伍,他饱读伍尔夫、斯特拉奇的书和福斯特的著作,斯特拉奇的讽刺风格理所当然地在他身上留下烙印。他博览各种哲学书籍,很多臆想的运用都来自宗教文化”,<sup>[6]52</sup>事实上,“凯恩斯自己也觉得‘他的世界观’滋养了他的经济学,使他对人类本性的理解远比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人’更为丰富、更为深刻。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思维越来越具有创造性,他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社会习俗”。<sup>[6]52-53</sup>

正是由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依赖于长期的学习和思考中所积累的广博知识,因而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往往会有大量的天才涌现的话,那么,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则是非常罕见的。社会科学领域之所以难以有天才,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说明:(1)社会科学知识主要是对社会经验事实的系统认知,这种系统认知主要源于人的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的取得都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2)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间接经验越来越重要,而间接经验除了与一些亲近的人进行直接交流外,更主要是通过书本或专著与大师之间的交流,知识的全面吸收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3)社会科学的天才性主要体现在理论构建的整体性和独特性上,而这种学说体系的形成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更依赖于长期的内省和梳理;(4)即使存在悟性突出的学人,他具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及发现规律的高超能力,但要说服其他人相信其学说往往也要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以致很多有创见的文章在发表时甚至屡屡被拒而不为世人所知;(5)社会科学中理论发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实践中,要得到认可也必须为社会实践所印证,而这种从理论到应用的过程不仅需要适合的社会环境,也存在漫长的时滞,以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颁发的往往是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6)

社会科学理论涉及到几乎所有个体的利益,因而它必须面对大量个体在观点和利益上的分歧,而不是构建一个具有形式逻辑或者自圆其说的公理体系。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理论发现往往要花费学者毕生的精力,而很少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依靠灵光一闪的智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即使如此,在毕生中依然没有完成。

同时,正是由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往往是用一般性原理来处理某一具体问题,因而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可以相对专注于狭窄的专业;但是,社会科学家却不可能借助于一般性原理来解决复杂多变社会现象,相反,它在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时都必须借助其他方面的知识。迪尔凯姆就强调,任何社会事物都必须在一定的“场”中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因而必须把社会现象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作综合的考察才能发觉存在和影响着的它们的各种深化关系。所以,迪尔凯姆说,“社会现象必须加以细致考察才能被真正了解。也就是说,研究事物,必须以事物为主,而不能以一般性原理为主;对一些特别的问题,必须进行特别的试验才能弄清楚。”<sup>[7]2</sup>例如,在考察自杀现象时,就不能单从自杀的收益-成本来分析自杀率的变化,而必须将自杀事实与自杀者的居住地区、居住环境、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社会条件一起进行考察。社会科学在实践上的知识要求也可以从“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中窥见一斑:传统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诸经以及《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的基本思想都是相通的,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了包含政治(制度)和心性(生命)内容的整体性儒学资源。

显然,正是由于任何社会问题的处理都不是孤立的,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共性,必然会与其他社会关系牵涉在一起。因此,哈耶克认为,“必须掌握一门学科这个学习目标不管多么重要,在社会科学中对于一个题目的技能不能成为惟一的目标。对于那些意识到我们领域的问题确实重要的人来说,专业研究应当成为建立一种全面的社会哲学而奋斗的起点,一个人要想使这种奋斗有所收获,他必须让自己的研究为自己开阔视野,不应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他的专业学科中的问题上。”<sup>[8]480</sup>譬如,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知道如何提高物质财富总量而不知财富的分配,不知社会正义,也不知人类需求的变化;那么,他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必然会加剧社会的矛盾,导致社会秩序扩展的中断。为此,哈耶克告诫说,“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大可断定,如果他牺牲自己的一般教育,专注于自己的学科,他会成为更出色的化学家或生理学家。但是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却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它不仅妨碍我们成为有吸引力的伙伴或良好的公民,并且可能有损于我们在自己领域中的能力。一名物理学家即使仅仅是物理学家,仍然可以是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社会最有价值的成员,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个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事实上,“在理想世界里,难以想象会有不了解法学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经济学的人类学家、不懂哲学的心理学家或对其他课题一无所知的史学家。”<sup>[8]450</sup>

可见,尽管学术有专攻,但要真正理解社会现象,真正促进社会科学的理论提高,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知识的范围。事实上,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乃至哈耶克等之所以能够提出影响深远的思想,为人类留下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就在于他们本身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譬如,哈耶克首先在法学院学习,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学习了社会科学课程,获得了社会政治博士学位,并首先从事哲学尤其是心理学的研究,后来师从维塞尔和米塞斯后又开始学习经济学获得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学位;正因如此,哈耶克探究所涉猎的领域涵盖了从理论心理学、经济理论、技术经济学、政治理论到社会法律哲学等,从而建立了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理论,成为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诸领域的思想丰碑。为此,华勒斯坦等写道:“对历史的关注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分析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报道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的多。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

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sup>[9]</sup><sup>106</sup>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有清晰的认识:即使医生和工程师等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无知,他们也可以以专业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甚至观察越专业化,问题的焦点就越明显。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观察越专业化,对焦点四周的所有事物往往会越是无知;同时,社会事物之间本身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无法用人为方式加以隔绝的。

### 三、一种错误认知观的重新审视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契合,而这就要求教育的跨学科化,并抛弃被日益强化的知识专业化的成见。利奥塔尔就指出,“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对想象性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并不比学科集体更有能力”,<sup>[10]</sup><sup>111</sup>但是,“跨学科性这一口号却遭到大学封建主义的反对”。<sup>[10]</sup><sup>109</sup>事实上,正是由于马歇尔的努力,经济学开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立足于自身的研究领域;而且,随着独立的经济学院与经济学位的设立,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拉大了:不但经济学的学生很少学习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知识,而且经济学依靠复杂的数理模型构筑起来的封闭体系也使得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学科越来越望而却步。结果,现代高校就逐渐成为并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技工的场所:它不是提高人的思辩能力,不是增进学生真正的社会认知。显然,这种状态对社会科学的教育所产生的祸害尤其严重,因为社会现象的整体性更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在社会科学的统一性已经遭到极大破坏的今天,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所受的限制已经越来越接近可以承受的极限,这是华勒斯坦等提出对整个社会科学进行否思的根本原因。

一般地,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本身是西方创设的,社会科学诸分支的分离现状也源于西方社会;究其原因,基于逻辑推理与经验事实分离的二元观,西方社会的学风贵专崇知,而不是求真识和全面。结果,现代西方教育就呈现出两类倾向:(1)最高学位主要是培养特定领域的专家,他的研究及其应用必须依赖于其他专家的分工;(2)一般的义务教育则是所谓的国民教育,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不是引导思考。显然,正是受西方社会这种学术分科的影响,中国社会逐渐把西方的学位制引进了进来,并分别冠以学士、硕士和博士的称谓;在某种意义上,学士教育强调的是“学”而不是思,名与实(当前的情形)倒比较吻合,但硕士和博士却完全名不符实。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的词汇上,大学所授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义理之学,而那些被授予博士头衔的更是那些博学多能,广通五经之人;但是,今日之硕士、博士教育仅仅是培养一群某一狭隘领域内的学究,因而应该更恰当地冠以“偏士”、“专士”之名称。而且,受“分”的思潮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盛行着这样一个具有极大危害性的误区:“专”即是“深”,而“通”则意味着“泛”。

为了说明这一偏见,我们可以形象化举例说明如下:A、B、C、D分别代表着社会科学领域的四个大学科,而X1、X2、X3、X4又分别表示X学科中的4个不同分支,其中X代表着A、B、C、D中的一个学科(如经济学);此时,某甲掌握了A1、A2、A3和A4等A这一大学科下4个分支领域的细微知识,而某乙则花同样的努力掌握了A、B、C、D这4个大学科的基本知识,那么,我们能够说甲所掌握的知识比乙更多或者更深吗?显然不能,因为知识本身没有优劣等级之分。如果甲和乙都只是掌握这些知识而没有创新,那么他们的知识含量是无差异的,区别仅仅体现在特定场合的应用上有所不同。相反,如果甲仅仅掌握了A1、A2、A3和A4这4个分支领域的知识,而乙却在掌握A、B、C、D这4大学科之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认知而创建了新学科E;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乙对知识的认知比甲更深。钱穆曾指出,所谓知识,“知只是仅知其事,识乃识其内里之情。内在一体,始为真识。徒求于外,则乌从而知其体”。因此,“但见即知,却未必有所识。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能知到其人之内心深处,乃得谓认识其人”。<sup>[11]</sup><sup>114</sup>因此,作为知识的“深”,贵在真正为自己所吸收,尤其是能够深入地认识知识结构并在此基

础上有所悟见;也就是说,知识的“深”或“精”主要体现在:是否有所创新上,而不体现在知识的种类上。

不幸的是,由于长期深受错误思潮的影响,目前大多数集中于某一狭隘领域的学人却被广泛地视为“专家”,他们的知识被视为真学问;尤其是,广大学子还往往想当然地以为搞数学模型的人比较高深,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公式乃至符号一般人都看不懂。但显然,这种认识明显误解了社会科学的基本特性,社会经济现象本身是受各种社会性因素影响的,没有较为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同时,这些经济学子往往因为认识那些侧重思辨逻辑的那些文章中的文字就把它视为肤浅的,但实际上,又多少学子能够真正理解文字逻辑中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进行审视,如自由、民主、科学、公正、效率、市场、法律、企业、国家这些熟视无睹的概念,我们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们的含义呢?关于这些概念,每个学科都有大量的学者在进行梳理和发展,笔者也对很多概念写了专门梳理的文章。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经济学子关注的概念:产权。尽管当前经济学子都知道并喜欢运用“产权”一词,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产权”的真正含义?一般大都以为,只有产权明晰才有效率,而产权明晰基本上体现为产权私有;但实际上,产权反映了物之属性在人之间的界定,而物之属性丰度无法完全测度,因而产权根本上是无法界定清晰的,产权也仅仅反映了某些已知或可估测属性的界定。正因如此,产权是无法完全私有化的。例如,你尽管拥有自己的私人财物,但是,你却不能随意支配它,你的消费、转送乃至销毁都面临着社会的种种制约;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宣称自己拥有完全产权呢?显然,相对物的使用效率而言,产权安排仅仅是对已知属性在相关者之间的责权界定,从而体现了一组激励和约束关系;而且,这种激励和约束关系的贯彻必须由一套相应的执行机制来保障,没有切实的执行保障,责权界定就是虚置和空洞的,也就根本没有实际的产权安排。其实,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产权规定国有财产属于全体国民所有,而国民委托相关政府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产权非常清晰;但问题是,有什么机理来保障国民的利益,来监督这些并非由全民直接聘用的企业经理、政府官员不会损公肥私?如果没有其他保障机制,产权仅仅是一句空话,某A说他对其所购买的电脑拥有产权,但某B却可以依靠武力或其他手段抢夺过去却不受任何惩罚,A自己面对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那么,A果真拥有他所宣称的产权吗?

因此,产权结构实质上就是一种治理机制,产权安排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责权界定和相应的实施机制。但显然,我们对产权的流行理解往往深受西方价值观的误导,因为西方社会崇尚的是权利文化,每一个人都强调他的天赋权利,却没有考虑到每一个权利背后都必然隐含了相应的责任,否则必然会出现权利之间的冲突。当然,具体产权的责权如何界定,则关系相应实施机制的成本问题,而不同产权安排下的实施成本则涉及到对具体环境的统筹考量。譬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高强度的监督是可行的,因而产权可以相对集中;但是,在目前这种市场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的和平环境中,依靠外在的第三方监督可能导致成本变得很大,此时相关者的相互监督是更可行的,因而一些产权也开始在私人之间进行界定。从这一个流行概念的审视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和政策都需要充分借鉴其他学科所积累的知识。实际上,这也早已在孔德所提出的科学等级体系中得到了反映:数学等自然科学是最早出现的科学,它的逻辑相对简单;社会科学则是后来出现的,它需要以前面出现的所有学科的知识为基础,因而更复杂。同时,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基于物的自然逻辑就比人类社会中的行为逻辑简单得多,这也意味着,纯粹借助自然科学的自然理性要比人类社会中的实践理性要简单得多;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思路已经把社会问题大大地简化了,从而也就导致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关于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偏狭性,典型地体现在经济学的课程设计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看英国华威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斯基德尔斯基以英国为例所作的描述和剖析。英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前两年一般要修三门经济学课程、三门数学课程和另外两门选修课程,三年级时则要从选修单中

择取四门课程包括数学方法、管理会计、商法等;同时,如果学生有意于进一步深造则往往被孤立去选修数学课,因为这将大大有利于他们跻身一流的大学继续他们的博士阶段学习。因此,经济学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拨给了数学训练,这就意味着,学生只要数学成绩优异就能拿到一流的荣誉学位,只要计算正确就能拿到数学卷的满分。结果,英美大学一流经济系的学生很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却没有读过斯密、马克思、穆勒、凯恩斯、熊彼特乃至哈耶克的只语片言,他们也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将宏观或微观经济学的分析纳入经济史或政治经济学等更广泛的领域中思考。基于这种现状,斯基德尔斯基提出了改进路向:学生不应该仅仅凭着经济学或者数学的学习就获得荣誉学位,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都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接受的必要训练,而不是把他们作为选修课;而且,每门课都被加以不同的权重系数,这会给正在成长的经济学研究者一个全方位的视野,调查其他学科是如何研究人类行为的;同时,经济学的学生必须首先拿到第一个基础学位,而专业方向的选择则可以等到以后一些时间。基于这种改革,就可以保障经济学科的去专业化:经济学不仅把自己从普通的语篇中分离出去,还极少参与和相邻学科的建设性对话。<sup>[6]195-196</sup>当然,为了向本科生开设专业以外的通识课程,就需要配备一批非专业出身的教师或教授,华勒斯坦等甚至提议,“要求每一个系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教职员不具备该学科的学位。”<sup>[9]112</sup>

可见,对知识“深”的界定并不在于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而主要体现在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原有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显然,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要取得真正的创新,更主要在于对各分支所积累的相关知识进行契合,而不是局限于一个狭隘领域进行逻辑推理。法国的佩雷菲特就拿钻牛角尖来作比喻,“挖的越深,牛角的洞就越窄,挖出的东西也就越少。”<sup>[12]2</sup>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对知识和学科理解的深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认知到该知识和学科本身的不足,这种认识往往需要跳出本知识和学科的主流领域,而借鉴其他领域的知识。因此,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的发展不在于绝对的专业化深化,更主要是现有知识之间的沟通和互补。实际上,当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象牙塔内研究人类行为时,凡勃伦则根据人类及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人类行为;在凡勃伦看来,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很多,而他将这些其他力量导入经济学分析之中,通过从其他学科获得的见识中努力拓宽和丰富经济学。凡勃伦去世后不久,其学生米契尔也写道:“没有一个生长在残暴苛政下的思想解放者像他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名声卓著,且探究的领域之大以致无人企及。”<sup>[13]54</sup>因此,里昂惕夫就号召经济学家们拓宽知识面,与社会学家、工程师和管理学家共同研究和工作,因为在这些领域中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更有价值,其他学科可以教会经济学家许多有关数据收集和理论检验的用途和重要性方面的知识。

#### 四、结 语

社会科学涉及的是具有公共性的问题,它无法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下通过抽象的演绎而获得认识,而是要充分剖析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认知就必须建立在跨学科的知识契合之基础上,而这又需要尽可能地夯实和拓宽研究者的知识素养。事实上,一个人的知识面越窄,其总结的理论就越容易被证伪;而一个人的知识越宽,就容易考虑综合他人的角度,从而也就越容易为他们所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权威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的权威就体现在他所具有的广博知识结构及其系统化理解上。为了尽可能地拓展知识和思维的限度,不仅要対前人积累的经典著作进行系统的梳理,也要形成一个对理论进行自由讨论的空间;而且,这种讨论不能局限于特定的领域、学科,更不能形成排他性的利益团体。哈耶克就指出,“如果一位经济学家与一位历史学家,或者一位法学家与一位政治学家信奉某些共同的前提,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那么他们间的探讨所能取得的成就,就要比那些对这些基本价值颇具分歧的同一学科的研究者之间的讨论能获得的成就大得多。”<sup>[14]213-235</sup>同时,理论要良性发展,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理论讨论空间。因为只有进行

讨论,不同的观点才得以交锋,而不同的视角才有共容的可能。事实上,只要本着真正的学术探究精神,而不牵涉其他的社会政治因素,那么,无拘无束的交流就必然会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知。为了体会知识之广博对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社会互动论的创立者库利的警句吧,他说,“在有组织的生活中,隔绝是行不通的,而正确的专业化不会导致隔绝。在专门知识和总体知识之间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存在着分界线。不从与整体的关系出发,一个人怎么去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呢?难道一个学生熟悉了一门专业,他的总体知识就少了吗?难道他不是将已学会的知识当作窗口从中观察普遍的事物吗?”<sup>[15]106</sup>

为此,斯基德斯基指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应该吸收一定的非专业出身的教师,开设一些通识课程以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碰撞;但不幸的是,这种温和的教育改革却很难成功,因为教科书、著名期刊、终身任职权、工作机会等都是建立在各类“专家”所必需的越来越狭隘的技能要求上。<sup>[6]196</sup>事实上,首先夯实理论素养再进而对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反思、解构和创新的学人在现代学术界越来越少了,现实情形往往是如玛斯特曼等人指出的,“目前的情况是,务实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研究库恩的东西,而不是波普尔的东西。情况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里,现在通行的是‘范式’而不是假说。”<sup>[16]73-115</sup>显然,社会科学的理论反思更为主要,一味遵循某种范式往往只会窒息了社会科学中的思辩和洞见。波普尔强调,“所有大学水平(如果可能还可低于这一水平)的教学都应当训练和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但是)‘常规’科学家……所受的教育却是很糟糕的。他在一种教条式的气氛中受教益,他是教条教训下的牺牲品。他学会一种能用的技术但却根本不问其为什么。结果,他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应用科学家的人。”<sup>[17]63-72</sup>如果说波普尔提倡的批判方法适用一切科学的发展的话,那么,它尤为适合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

#### 参考文献:

- [1]鲁迪·拉克斯.知识优势:新经济时代市场制胜之道[M].吕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 [2]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R].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9(6).
- [3]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M].马志娟,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4]梯利.伦理学导论[M].何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朱泱,孙鸿敬,李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6]斯基德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M].秦一琼,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 [7]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王永,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8]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9]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10]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11]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12]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M].朱秋卓,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 [13]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M].张敬惠,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 [14]哈耶克.自由与交流:“朝圣山学社”首次大会开幕辞[M]//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15]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16]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M]//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17]波普尔.常规科学及其危险[M]//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